

益贫式增长、分配关系优化与共享发展

范从来 谢超峰

摘要 共享发展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新阶段与新方式。共享发展理念的内涵要求“做蛋糕”和“分蛋糕”应统一于现代化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在该理念下,一方面通过益贫式增长消除绝对贫困,另一方面通过优化收入分配为经济增长构建有效的激励机制,做到兼顾公平与效率,以真正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具体而言,可以以技术创新为动力的商业模式创新增加劳动者经营性收入改善收入结构;通过调整分配关系使得劳资共赢;实施宏观经济政策时不仅要考虑其稳定经济增长的作用还要考虑其益贫性。

关键词 共享发展 益贫式增长 经营性收入 分配关系

作者范从来,南京大学大学商学院教授(江苏南京 210093);谢超峰,南京大学商学院博士后、河南师范大学商学院讲师(河南新乡 453007)。

中图分类号 F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17)03-0061-07

一、实施益贫式发展战略

共享发展实现全面小康的奋斗目标的重点难点就在“全面”二字上,这就意味着要让全体社会成员都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对于中国这样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而言,首要目标就是全面脱贫即消除绝对贫困。大部分的经验研究表明,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绝对贫困发生率迅速下降。但问题是当经济增速下降时,如何继续实现减贫。特别是中国逐渐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将会维持在一个中低水平,在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逐年递减情况下,未来几年内 14 亿人口集体步入小康社会的难度会加大。益贫式增长(pro-poor growth)应该是主动适应新常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共享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大战略目标的一个可行的发展战略。

在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增长、不平等与消除贫困等复杂问题的反思之后,许多国际发展组织在 21 世纪初提出了益贫式增长,旨在寻求更有利于穷人的增长方式。益贫式增长通常的定义是经济增长给穷人带来的收入增长比例大于平均增长率。^① 益贫式增长是经济学家们关注贫困、增长与分配问题所提出的一个发展经济学的概念,和普遍增长(broad-based growth),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等概念一脉相承。它要求:(1) 益贫式增长是机会平等的增长;(2) 在增长中强调对贫困群体的关注,经济增长应有利于大多数人并且具有持续性;(3) 是充分就业的增长,应该使穷人充分就业并使劳动收入增长率高于资本报酬增长速度,这样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

尽管贫困是一个多维的概念,但是毫无疑问在机会均等条件下使全体劳动者特别是低收入人群实现增收是首要目标。这不仅有利于实现全面小康,同时也有利于中国经济健康持续发展。收入优先增长是实现

^① 周华、李品芳、崔秋勇:《中国多维度益贫式增长的测度及其潜在来源分解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1 年第 5 期。

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①中国经济增长长期依赖投资拉动、出口带动以及自然资源等要素的粗放扩张,尽管国内生产总值快速增长,但是人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并没有随着经济快速增长而迅速提升。如果以居民人均收入和人均 GDP 之比表示经济增长中居民的获得感的话,从图 1 可以看出近几年中居民的获得感并不高。三位一体的共享发展理念要求经济发展为了人民,应使全体国民在经济增长中有更高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而非数字的增长。

在共享发展理念下,不仅要求居民平均收入快速增长,还要使全体国民在经济增长中有更高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因此,应该实施带有益贫效果的收入优先增长战略。这就需要分析中国居民当前的收入结构,寻找具有益贫性及可持续的增长点。

按照现行统计口径,中国家庭收入的来源主要有: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从图 2 可以看出,中国居民家庭收入形成了以工资性收入为主体的收入格局。

图 1 2005—2015 年人均居民收入与人均 GDP 之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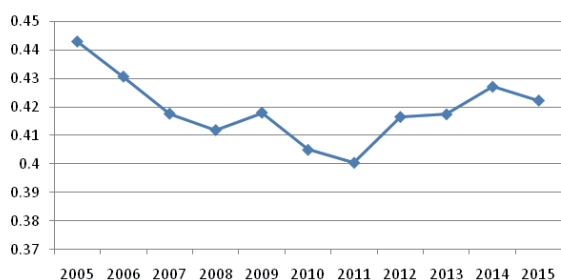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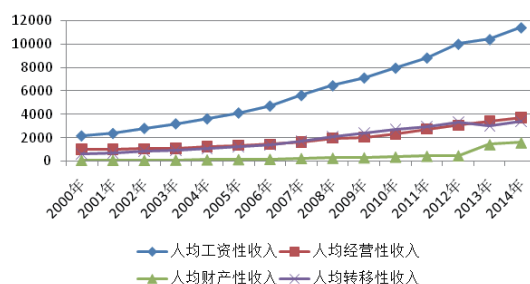


图 2 2000—2014 年全国居民人均收入结构^②



不同收入来源的经济属性并不相同,自然在经济运行过程中的作用也不相同。因此,持续增加收入并注重益贫性,就需要分析各项收入来源在经济中的作用。转移性收入主要包括离退休金、失业金以及赔偿等,显然增加该项收入并不能保障全民共享改革成果,特别是在当前“未富先老”的背景下这种做法也不可持续。财产性收入主要是指家庭拥有的动产和不动产所获得的收入,包括利息、租金和红利等。从财产性收入的统计范围可以看出,财产性收入和宏观经济具有密切联系,宏观经济形势稳定向好有利于财产性收入增加,但是宏观经济是周期性波动的,因而财产性收入持续增加是比较困难的。同时财产性收入主要和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以及金融市场等相关,这些市场主要是属于虚拟经济,所以如果财产性收入快速增长就意味着虚拟市场的泡沫增加,那么这些市场乃至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就会减弱。特别是,增加财产性收入也不具备益贫性,因为广大低收入人群是没有股票或者房产甚至存款的。因而财产性收入增长很难具有持续性也不具备益贫性。

那么一种直观的想法是增加工资性收入。中国居民工资性收入在总收入中比例维持在 50% 左右,低于发达国家如美国的 70%,可以认为中国的工资水平较低。较低的工资水平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优势之一,因此工资增长是弥补之前的工资缺口,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需要考虑的是工资提高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以及是否具有益贫性。一方面工资可被视为经济运行成本,因此工资持续上涨会使得经济运行成本上升从而可能会导致失业及物价的上涨,因而通过增加工资性收入来实现居民收入增加需要权衡其收益与成本。^③而且增加工资性收入对中国当前阶段消除贫困作用有待探讨。因为经过多年富有成效的扶贫工作,中国的贫困发生率明显下降,区域连片分布贫困区转向散点式分布,当前扶贫的主战场是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主要包括六盘山区、秦巴山区、武陵山区、乌蒙山区、滇桂黔石漠化区、滇西边山区、大兴安岭南麓山区、燕山—太行山区、吕梁山区、大别山区、罗霄山区等区域。^④这些地区缺少足够的产业支撑,当然增加工资性收入对这些地区就是难以实现的。

① 范从来:《中国收入优先增长中的结构优化》,《学术月刊》2011 年第 10 期。

② 由于从 2013 年开始国家统计局开始了城乡一体化的住户收支调查,2013 年以前的数据是根据统计局公布的城乡调查人口为权重加权而得。

③ 一方面工资上涨会使得企业家选择相对价格更低的生产要素因而可能会造成失业率上升,另一方面成本的上升会带来价格总水平的上涨。

④ 张琦、冯丹萌:《中国减贫实践探索及其理论创新:1978—2016 年》,《改革》2016 年第 4 期。

相反，我们国家通过多年的扶贫实践，摸索出了开发式扶贫工作经验即变“输血”为“造血”。开发式扶贫就是通过利用贫困地区自然资源，进行开发性生产建设，形成贫困地区和贫困农户的自我积累和发展能力以解决温饱、脱贫致富的扶贫方式。家庭经营性收入正是居民通过生产经营活动获得收入的办法，所以从收入结构的角度而言，开发式扶贫是以增加贫困地区居民的经营性收入为主要目的和手段实现脱贫。可见，增加经营性收入具有较强的益贫性，而且从中国居民当前的收入结构来看，也具有较大的增长空间。增加经营性收入对保持中国经济增长，增加人民收入减少贫困具有重要意义。

益贫式增长既要益贫同时还要增长，共享理念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要在共建中实现共享，那么增加要素所有者经营性收入是一个可行的办法，实现做大蛋糕同时也使得贫困人口成功脱贫，使得一切生产要素的所有者的活力得到激发。

二、增长中不断调整分配关系

益贫式增长是解决绝对贫困的重要保障，但是共同富裕和共享发展不仅要解决绝对贫困还要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从理论上讲，益贫式增长是要同时解决这两个问题。但事实上发展经济学家们对益贫式增长也存在着争议，形成了绝对益贫式增长和相对益贫式增长的概念。所谓绝对益贫式增长是指穷人的绝对收益大于或等于非穷人，相对益贫式增长仅要求穷人收入增长率高于平均收入增长率。^①显然相对益贫式增长的定义相较于绝对益贫式增长更加宽松因而也被认为更现实。即便如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相对益贫式增长也是非常困难的。即使成功实施有利于减贫的经济政策消除贫困，也依然不能保证消除不平等。经济增长、不平等与减贫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众多发展经济学家认为不平等对经济长期增长是有害的，^②Kakwani 和 Pernia 指出，贫困的减少同时依赖于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③换言之，经济增长并不是减贫的充分条件，Chiara Amini 和 Silvia Dal Bianco 使用广义系统矩估计的方法，发现经济增长的减贫效果严重依赖于初始的收入分布与不平等状态^④，周华、李品芳等分析了 1981—2005 年中国相关数据，认为影响中国益贫式增长的最重要因素不是再分配和收入增长，而是收入初次分配。^⑤所以即便乐观认为实施益贫式增长可以保证全面脱贫，但不能乐观认为会解决相对贫困问题，反而相对贫困问题还会影响到减贫效果。所以，要在经济增长中不断调整分配关系使得增长更具有益贫性。

共享既是发展的目的，也是发展的手段，共享作为发展手段最终要求不断调整分配关系。众多发展经济学研究表明，经济能否健康持续增长和初始的分配关系有着密切关系。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经过多年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取得显著变化，但是以基尼系数表示的收入差距自 2003 年以来，一直处于全球平均水平 0.44 之上，2008 年达到了最高值 0.491，2015 年回落至 0.462，为近十二年来新低，即使这样也远高于国际公认“警戒线”。如此大的贫富差距意味着经济活动的参与者的初始财富分布不均衡，因而容易形成阶层固化，产生制度性贫困，不利于益贫式增长。制度性贫困从宏观意义上讲，是由于相关制度安排造成的资源在不同区域、不同阶层、不同人群、不同个人之间的权力不平等和分配不公平，进而造成某些区域、阶层、人群和个人的贫困。^⑥制度性贫困是可以通过制度设计和公共政策消除。换言之，实现全面小康社会，要求在实施益贫式增长的同时还要不断调整分配关系消除制度性贫困以保证机会平等。

借鉴蔡荣鑫对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之间关系的描述，^⑦本文同样利用人口和收入的分布曲线来（如图 3 所示）表示益贫式增长、共同富裕等概念之间的关系。

① 周华：《益贫式增长的定义、度量与策略研究——文献回顾》，《管理世界》2008 年第 4 期。

② Barro R J. "Inequality, Growth, and Invest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Vol. 5, No. 35, 1999, pp. 1770—1807.

③ Kakwani, N. and E.M. Pernia, "What is Pro-Poor Growth?" *Asian Development Review*, Vol. 18, No. 1, 2000, pp. 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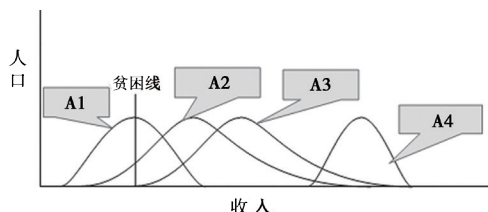
④ Amini C, Bianco S D. "Poverty, growth, inequality and pro-poor factors: new evidence from macro data," *Journal of Developing Areas*, Vol. 50, No. 2, 2016, pp. 231—254.

⑤ 周华、李品芳、崔秋勇：《中国多维度益贫式增长的测度及其潜在来源分解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1 年第 5 期。

⑥ 文雁兵：《制度性贫困催生的包容性增长：找寻一种减贫新思路》，《改革》2014 年第 9 期。

⑦ 蔡荣鑫：《“益贫式增长”：越南的实践与经验》，《东南亚纵横》2009 年第 1 期。

图 3 经济增长与收入分布示意图



起初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状况可由 A1 曲线所表示, 此时大部分人口处于贫困线以下, 但收入分配比较平均。随着经济发展, 平均收入增加但是同时收入差距快速拉大, 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随着经济发展水涨船高但随着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递减, 还有一部分人难以摆脱贫困, 此时居民收入分布的状况可由 A2 曲线所示。实施益贫式增长模式有利于低收入人群增收同时会使贫富差距有所减少。但正如前文所分析的, 由于经济增长、减贫和不平等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 实施益贫式增长有助于低收入人群增收但对减少不平等的作用可能有限, 所以此时的收入分布就如 A3 曲线所示, 所有人都摆脱了绝对贫困但收入分配的差距仍然较大。那么如果在增加低收入人群收入消除绝对贫困的同时积极主动调整分配关系促进收入分配更加合理, 使得所有人都从经济增长中有更强的获得感, 形成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良性互动, 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那么这就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即如 A4 曲线所示。这里需要澄清的是, 共同富裕既不是同时富裕也不是同等水平的富裕。共同富裕不能忽略经济主体的异质性, 所以共享发展绝不是回到绝对平均的状态, 即使到了共同富裕阶段, 生活水平也是会存在一定的差异的。

三、共享发展理念下共同富裕的实现

在共享发展理念下实现共同富裕可从两方面入手: 通过益贫式增长增加普通劳动者收入, 消除贫困; 通过分配关系的优化缩小收入差距。益贫式增长和分配关系优化相互促进, 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一) 通过技术与商业模式创新增加经营性收入实现益贫式增长

2016 年“分享经济”(Shared Economy)这个概念第一次进入《政府工作报告》。《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支持分享经济发展,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让更多人参与进来、富裕起来。”^①“分享经济”这个概念, 可以追溯到由美国得克萨斯州立大学社会学教授马科斯·费尔逊(Marcus Felson)和伊利诺伊大学社会学教授琼·斯潘思(Joe. L. Spaeth)于 1978 年提出的协作消费(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 他们提出, 拥有闲置资源的机构或个人有偿让渡资源使用权给他人, 让渡者获取回报, 分享者利用分享他人的闲置资源创造价值。^②这一概念依托互联网平台, 特别是智能手机等移动终端的普及, 迅速变成现实且实现了快速发展。分享经济自 2008 年率先兴起于美国, 以分享个人闲置房屋、车辆、个人时间、技能等资源为主要形式, 当前由于 Uber 公司(汽车租赁)、Airbnb 公司(房屋租赁)、Taskrabbit 公司(劳动力雇佣)等一批明星代表企业的迅速崛起, 吸引了市场的广泛关注, 被认为是引领全球经济未来发展最具潜力的创新经济模式。分享经济使得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网络直接参与全球市场, 经济主体也越来越多元化。

分享经济是由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冲击所带来的新的交换方式与生产方式。分享经济融合了信息经济、网络经济以及数字化经济, 将复杂的集中的工作变成了简单的分散的工作, 扩大了分工, 降低了交易成本, 从而使更多人以更低成本参与到经济当中。社会生产包括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环节, 分享经济借助互联网技术都可以嵌入其中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商业模式。包括:(1) 分享生产型, 主要是基于资产或技能的分享;(2) 分享交换型, 主要是基于二手商品转让和再流通;(3) 分享消费型, 主要是共享或租赁产品服务。

分享经济在交换环节, 利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手段提高了匹配效率, 节约了交易成本减少流通过费用,

① 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6-03/05/c_128775704.htm.

② Felson, M.; Spaeth, J.L. “Community structure and 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 a routine activity approach,” *Am. Behav. Sci.* No. 21, 1978, pp. 614—624.

提高了资源使用效率。在生产环节,通过技术创新、知识技能分享,降低了交易成本,改变了企业组织形式,有利于形成对等的市场环境(peer-to-peer market place)。分享经济从理念上将改变传统的企业组织架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费尔普斯在《大繁荣》一书中描述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景象:有创新思想的人士提出创意;不同投资主体的参与,例如天使投资人、风险投资家、商业银行、储蓄银行和风险投资基金;不同生产商的参加,如创业公司、大公司及其分支机构;各种市场推广,包括制定市场策略和广告宣传等活动;终端客户的评价和学习;消费者介入并引导创新。^①简而言之,分享经济以信息技术为纽带,实现产品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在资源拥有者和资源需求者之间实现使用权的交易(分享),从而使要素所有者获得经营性收入。分享经济将使人们以更低成本参与到经济当中,更容易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局面,利用互联网平台,人人都有可能成为创客。

上述愿景在互联网嵌入社会生产生活各个角落之后是可以变为现实,因为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使得社会化生产从大规模集中式的流水线生产逐步转变为使用智能化工具适度规模的个性化生产。因而催生出了以信息为纽带的分享经济模式,移动通信、3D打印等技术条件可以使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更容易直接结合起来,一辆汽车、一台电脑甚至是一部手机都将成为生产工具,劳动者成为自己劳动条件的占有者。这不仅对贫困地区居民脱贫致富形成新的思路,更为城镇低收入家庭增加收入提供了一条可行路径。^②

分享经济不仅可以帮助低收入者增加经营性收入,同时还会促进经济增长,因为分享经济本质上是技术创新,提升了效率。更直观的,Airbnb显示,个人房屋租赁将会带来长期经济效益,由于Airbnb的房租较低,游客在旧金山逗留时间更长,Airbnb用户平均花费1100美元,高于酒店旅客的840美元。^③

分享经济不仅有利于人们增加收入,同时还由于它会改变企业雇佣模式和劳动力全职就业模式,因而也会使劳资关系发生改变。传统的雇佣方式要求劳动者在固定时间内进行集体劳动,相应地企业要承担雇佣者的工资、保险退休金等义务。但是通过网络共享信息平台,社会个体可以自由选择自己擅长的任务、工作时间和工资,弱化了传统劳资关系对就业个体的约束。从企业的角度看,分享经济模式弱化了企业承担的劳资义务,员工奖金、保险、退休金以及工会之类的劳资关系要素由企业承担向社会承担转化,进一步提高企业经营决策调整的灵活性。分享经济如果在生产领域进一步深化,将会带来创新型劳资关系模式,改变、重塑传统劳资关系,将使社会成员成为自由职业者和兼职人员的混合体,使全社会成为一个全合约型社会。这样不仅有利于创新从而做大蛋糕,同时在初次分配领域分好蛋糕。特别是在劳资关系上,这就从某种程度上实现了“自由人”联合生产,实现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社会局面。技术冲击带来的商业模式创新直接效应是增加参与者的经营性收入,间接效应是会调整生产关系,从而调整社会初次分配关系。

(二) 调整分配关系协调劳资双方利益诉求

中国实行的是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在现行制度下,市场在劳动力资源配置中发挥着主导作用,特别是在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等所有制经济当中,传统的劳资雇佣关系得以成立。从而在微观上以农民工为代表的广大普通劳动者的各方面权益难以得到保障,^④在宏观上,劳动者收入增速长期低于GDP增速,由此会产生宏观经济失衡。加之在快速推进城镇化背景下,城市内部出现新“二元结构”,农民工以及新生代农民工未能充分融入城市,也产生了不少社会问题。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意见》中指出,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劳动关系的主体及其利益诉求越来越多元化,劳动关系矛盾已进入凸显期和多发期,劳动争议案件居高不下,有的地方拖欠农民工工资等损害职工利益的现象仍较突出,集体停工和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任务艰巨繁重。^⑤中国城镇国有单位和集体单位就业人数远低于私营企业就业人数,以2014年为例,城

① 转引自洪银兴:《“互联网+”挑战传统的经济学理论》,《经济纵横》2016年第1期。

② 因为贫困地区的居民还可以利用当地的自然资源依靠产业扶持脱贫致富,而城镇低收入家庭不仅没有这些资源而且还要承受更高的物价。

③ 转引自汤天波,吴晓隽:《共享经济:“互联网+”下的颠覆性经济模式》,《科学发展》2015年第12期。

④ 富士康2010年的“十连跳”就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极端事件。

⑤ 《人民日报》,2015年4月9日01版。

镇国有单位和集体单位就业人数总和为 6869 万人，而仅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数就为 9857 万人。这是中国不断深化改革的重要成果，但是两种所有制单位的工资具有非常明显差别，从表 1 可以看出，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始终低于国有单位从业员工工资。这显然不利于全民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表 1 城镇非私单位和私营单位从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单位:元)

年份	非私单位	私营单位
2009	34130	18199
2010	38359	20759
2011	43483	24556
2012	48357	28752
2013	52657	32706
2014	56360	36390
2015	62029	39589

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冲突对共享发展造成了严重障碍，中国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起，资本收入比重上升，劳动收入比重下降，即要素收入分配向资本倾斜与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呈现并行的发展趋势。^①但是这种冲突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的“劳动-资本”剥削及其对抗关系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资本”关系更多体现为劳资双方对经济利益的诉求关系。^②

中国实行多种所有制形式，是和中国当前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从实践上也表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非矛盾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市场经济存在的根本原因是个别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即只要存在个别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不同利益主体就会存在，劳动交换就会存在。^③这些交换广泛存在于不同所有者之间，既可以是公有和私有之间，也可以是公有或私有的内部之间交换。在交换过程中，价值规律始终发挥着作用。同时由于存在一系列的“转化机制”的作用，劳资关系同样表现为不同利益主体的诉求。

所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解决劳资之间冲突，在经济制度上并不要求立刻全面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而是可以通过制度安排协调劳资双方的利益诉求，平衡效率与公平，实现全民共享发展。而要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资和谐共赢的劳资关系，关键在于建立工资的正常增长机制，特别是私营企业职工的工资增长机制。因此，可以考虑建立分享型劳资关系，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管理层持股已经成为现代公司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普通员工持股意义更为重大。员工持股可以使普通员工分享企业“剩余”，缓和劳资双方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冲突，还可以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当然建立这样的制度，需要建立和完善政、企、劳三方的协商机制。

(三) 发挥财政金融杠杆作用

尽管增加居民收入是属于微观领域，但其前提是要求更广泛的就业和更高的劳动参与率，因此宏观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同样能为共享发展产生作用。^④虽然发展经济学家对哪些因素以及如何有效消除贫困、减少不平等还存在着争议，但是在某些问题上也取得了共识：主要包括教育、健康、信用市场等。因此在这些领域可以发挥财政金融杠杆的作用以实现全面小康。

落实共享发展理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是贫困问题。党和政府始终关心贫困问题，不断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政策倾斜和政府的转移支付，使得贫困地区居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全面改善，通信、电力、交通等基础设施已经实现全覆盖，这对于保障基本的民生需求，同时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些生产性投入不仅能促进经济发展同时也有利于贫困居民增收，但是一方面生产性投入的减贫效果会边际递减，另一方面从长远来看，通过医疗、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来改善贫困地区人力资本水平，增强贫困人口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能力才是最重要的。人力资本是贫困人口最重要的资本，但是由于贫困地区的相关公共服务长期欠账，相对其他人群，贫困地区的劳动者应对辍学、疾病等冲击的能力更弱。相关研究表明，提高贫困地区的公共服

① 郭庆旺、吕冰洋：《论要素收入分配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2期。

② 权衡：《当代中国“劳动-资本”关系的实践发展与理论创新》，《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

③ 王天义：《〈资本论〉关于市场经济的逻辑》，《理论视野》2015年第3期。

④ 当然并非所有的宏观经济政策都具有有益性，因而什么样的宏观经济政策有利于共享也是发展经济学家们广泛争论的议题之一。

务水平有利于当地人的脱贫致富。Bloom 等将健康因素引入生产函数, 结果表明以预期寿命表示的健康状况对经济增长之间有显著正向影响。^① 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进一步表明, 疾病负担比宏观经济政策更能解释非洲增长率与东亚增长率之间的差别。^② Claeson 等的研究证实最穷的人的健康状况都比社会其他成员差, 相对贫穷的人和相对经济状况较好的人之间的健康状况存在很大的缺口。因此, 政策制定者可以加强在健康领域的努力, 侧重推进穷人的基本健康服务以及控制传染疾病。^③ 教育问题相对复杂, 但教育会促进经济增长还是普遍得到认可的。章元等认为, 基础教育构成农村居民人力资本的核心。^④ Klasen 的实证研究表明初等教育的扩张会缩小不平等。^⑤ 程名望等利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微观住户数据分析表明, 健康与基础教育所体现的人力资本是影响农户收入水平的显著因素, 对农村减贫具有显著作用。^⑥ 所以, 随着政府对贫困地区生产性投入减贫效应减弱, 各级政府可以更注重基础教育、医疗甚至环境等对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发展的影响, 加强基本公共服务投入, 实施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 提高农村和贫困地区公共服务的水平。这些举措不仅符合共享发展理念, 而且有利于消除各项扶贫政策的“碎片化”。

对贫困以及不平等问题一个重要解释就是信贷机会的差异。由于存在初始财富分布差异, 金融机构更倾向把钱借给有较强借贷能力的人, 这就意味着由于资本市场的完善, 初始财富分布的异质性使得穷人拥有较少机会进行生产性投资包括人力资本投资。因此可以尝试对金融市场的“嫌贫爱富”进行纠正, 学术界认为, 发展包容性金融可被视为解决贫困、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机制之一。^⑦ 这就需要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 鼓励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等机构投资处于创业时期的小企业, 稳步推进信贷资产证券化。^⑧ 所以发展包容性金融就要增加金融产品供给, 这才能实现双赢。一方面可以建立多层次的金融市场, 鼓励金融创新, 让金融市场创造和发行股权类和债券类等多样化的优质的投资理财金融工具, 另一方面增加股票等权益性资本的供给使得金融结构和企业共担风险, 共享收益。^⑨

四、结论

落实共享发展理念实现全面小康需要做出更加有效的制度安排, 其根本宗旨是继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 巩固公有制主体地位, 不断完善分配制度, 加强顶层设计构建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和结果公平的社会制度环境。中国当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经济从前期高速发展会逐步进入“新常态”, 若要实现全面小康社会需要补齐短板, 因而要采用适当的发展战略。具体而言, 一方面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可以实施益贫式增长战略, 将做大的蛋糕更多惠及低收入群体, 以促进全面脱贫, 增加劳动者经营性收入是可行的办法之一; 另一方面要优化制度安排, 调整分配关系促进收入差距的缩小使得经济增长更加具有益贫性。益贫式增长与优化分配关系具体可从两方面实现。从生产力角度来讲, 信息技术冲击产生了分享经济等商业模式。分享经济以重使用权、轻所有权的理念, 降低了普通劳动者参与经济活动的门槛, 可使普通劳动者获得更多经营性收入, 因而具有益贫性。同时分享经济从长期来看可能会改变劳资关系, 使得劳资关系更加对等有利于共享发展。从生产关系角度来讲, 需要协调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 使得不同利益主体和谐共处都能发挥自身优势, 以促进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这就要求资本与劳动平衡发展, 更好地保护劳动者权益, 实现工资的正常增长机制。最后, 实现全面小康社会需要借助财政金融支持, 在实施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时应注重其益贫性。

(责任编辑: 沈敏)

① David E. Bloom, David Canning, Jaypee Sevilla, "The Effect of Health on Economic Growth: A Production Function Approach," *World Development*, 2004, 32(1), pp. 1—13.

② Jeffrey D. Sachs *Macroeconomics and Health: Investing in Health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2001.

③ 周华:《益贫式增长的定义、度量与策略研究——文献回顾》,《管理世界》2008年第4期。

④ 章元、许庆、郭璟璟:《一个农业人口大国的工业化之路: 中国降低农村贫困的经验》,《经济研究》2012年第12期。

⑤ Klasen, S. "Economic Growth and Poverty Reduction: Measurement and Policy Issues," 2005, OECD Working Paper No. 246.

⑥ 程名望、盖庆恩、Jin Yanhong、史清华:《人力资本积累与农户收入增长》,《经济研究》2016年第1期。

⑦ 包容性金融并非一个成熟的理论体系, 和其相似的概念“普惠金融”于2005年由联合国提出, 其形态有小额贷款、微型金融。

⑧ 周小川:《推动包容性金融发展》,《资本市场》2013年第11期。

⑨ 范从来、丁慧、张淦:《金融改革的方向: 基于马克思借贷资本和现实资本理论的分析》,《经济学家》2016年第4期。

(下转第80页)

Theory about the Allocation Mechanism of Market-economy

Yang Wenjin

Abstract: Modern distribution theory is completely inconsistent with the reality. The nature of capital and the value is production relations. In the long run, it makes the elements of macroscopic field product allocation proportion and a variety of macro-proportion relations be relatively stable. In the short term, the proportion of product distribution is changed by the economic cycle fluctuation and determines its running direction. Regardless of the speed of technological progress, the profit margins of various industries are equal in the long-term and appear to be periodic oscillation around the average profit margin in the short-term. Each profit margin will change unbalancedly according to the periodic change of economic structure. This unbalanced change not only offers power to the economic system, but also keeps its relatively stability. The different speed of technical progress and the same profit margin make it clear that in the market-economy, the allocation between macro fields and industries is inversely proportional to their contribution. On the contrary, the product distribution is proportional to their contribution within the industry, and the share they gain are much more than they pay. These nature lead to the technological progress mechanism of market-economy. The special production purpose of capital and profit root in the nature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other nature. They determine the fact that the distribution of product and value is highly separate in market-economy. The allocation mechanism just take power and glory to the entrepreneur class and take the final product to the consumers.

Key word: market-economy, value, capital, allocation mechanism

(上接第 67 页)

Pro-poor Development, Optimizing the Distribution Relationship and Sharing Development

Fan Conglai & Xie Chaofeng

Abstract: Sharing development is the socialist essence request, is a new stage and new way of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The connotation of the concept of sharing development requires “make cakes” and “share cakes” should be unified in the every stage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On the one hand through pro-poor growth eliminate absolute poverty, on the other hand through the optimization of income distribution to construct an effective incentive mechanism for economic growth. Specifically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s the power of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increase operating income of workers and improve income structure, by adjusting the relations of distribution makes labor win-win situat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macroeconomic policies not only to consider the role of its stable economic growth but also have to consider the benefits of the poor.

Key word: sharing development, pro-poor development, operational income, distribution relationship